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全国政协书院“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与特质”研讨座谈会暨“周周论学”活动发言摘登

编者按：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14日，全国政协书院举行“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与特质”研讨座谈会暨“周周论学”活动，组织部分委员和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交流，并就如何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等重大理论实践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出席活动。现摘登如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成果和重要意义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产形态、社会分化、相互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

“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曾是学术界关于进入国家或者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文明只能由3300年前殷墟开始算起，但这个标准是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概括而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因。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启另一条研究主线即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大约8000年前后，中国开启文明起源进程。距今6000年到5500年之间，社会分化加速，生产、发展、信仰体系逐渐丰富，社会差别不断强化。距今5100年到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距今55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有竞争与交流，共同促进文明发展，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距今4500年前，通过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交流互动，从西亚地区接受了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等先进的文化因素，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距今4300年至41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到3800年前形成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整套礼乐制度，形成了王朝气象，并向周围辐射，形成方位广大的中华文化影响圈。由此可见，中华文明从距今5000年到4000年期间的各区域多元起源、齐头并进，转变为用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新进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

■刘斌：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立项，良渚遗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作为良渚遗址考古的主持者，我有幸亲历了发现良渚古城遗址的关键节点，并参与了从良渚古城发现到申遗的全过程，深感荣幸。

2006年在良渚葡萄畷遗址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的古河道，考古队沿着发现的线索，做出各种可能的推断，然后去钻探求证，终于在2007年找到了四面城墙。良渚古城是在长江下游第一

文明的定义、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贺云翱：“中华文明”话语中的“文明”是指人类在数百万年发展中最終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和成果。根据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它以国家形态及构成国家形态的各种文明要素为核心内涵。国家的出现视为人类文明的核心内涵，因为它是人类数百万年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国家诞生前的数百万年，人类社会是依靠血缘关系而存在和运行；国家诞生后的5000多年来，人类社会主要是依靠国家政治治理而存在和运行。为此我们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治理方式。

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探索，首先是中华文明各要素的起源探索。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人地关系等方面，不同文明要素经过5000年左右的持续发展，逐渐汇聚成文明的磅礴力量，在5000多年前，终于突破百万年原始血缘社会的惯性和制约，走出前邦时代，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等不同区域建

立了最初的地域性文明。这些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初期国家文明既是各个地域文化连续万年发展的结果，也是彼此间在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等各种文明要素不断交流提升中创造而成。大约在4400年前，中国大多数区域性文明进入衰亡期，而中原夏文明却从龙山时代进入到属于自己独尊的时代，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开启了中国的“青铜时代”。考古学家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以及二里头文化便是这一文明的具体实证。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李守奎：关于中国文明，一方面是在古老自源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在当代世界，可以说历史最悠久，文化遗存最丰富，文献记载最详备。另一方面，建立起符合事实、合乎逻辑的中国标准，中国的话语系统，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如果把文明放在世界的话语体系中，就要考虑一些共性。我们不能把考古发现中有无文字作为文明的必

中华文明发展的路向及其基本格局的形成

■叶小文：在进一步研究中，建议将“中华文明格局”的定义，由“多元一体”调整为“多源一体”。“元”和“源”一字之差，相去甚远，有必要认真辨析。从中华文明发展路向的考古实证来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多处遗址及周边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仔细辨析，揭示的发展路向正是多种源流汇为一体的。

从中华文明发展基本格局的历史脉络来看，中华文明演进路向或形成格局和特质，始于一个特殊地域——共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共同的农业文明，由此形成和养育了先称为“华夏”、后名为“中华”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中华文明之不同于其他文明，特别是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始于“一元”而走向“一统”的物质基础。

从“元”之本义看，现在讲文化、文明，广泛使用“多元”这个概念，把“多样”、“多源”皆说成“多元”。从中华文明起源而言，所谓“满天星斗”说其实是“多源”，“多源”比“多元”更为恰当，而就思想史而言，则讲“一元”更精准。从“大一统”的“一元”文化传承来看，“大一统”之相延，以“一元”文化传承为基。我国各民族文化交错杂居，显现为“多源”，但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血缘上互相融合，不断从“多源”融为“一体”。从哲学上看，“多元一体”这个概念，“多元”是个性，“一体”是共性，共性必寓于个性之中。“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以“多源一体”

中华文明起始阶段的主要特质

■王学典：中华文明起始阶段的特质，从起点上就与西方文明不同。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能够为文明进程提供重大动力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新工具与新技术的重大突破及广泛使用；二是人类社会组织形式发生大规模的变迁。这种由新工具和新技术作为社会变迁标志、文明进步重要推动力量的，可以称之为技术主导型文明范式。但要认识中国早期文明，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或者说政治、伦理、制度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可能更为关键，这种由人类社会组织形式发生重大变迁，从而推动文明进程形态，称之为伦理主导型文明范式。

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属于伦理主导型文明范式，这是中华早期阶段文明的一个基础特质，伦理主导型文明范式推扩至族际关系的处理，其成果便是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伦理主导型文明模式还可阐释中国古代表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这便是天道。天道有其自然与物理性的内容，中国古代天道之天，不仅仅是四季的轮回、日月星辰的运行，更是伦理之天、伦常之天，天道循环，天网恢恢等观念，带有鲜明的伦理性内容，进而以此来说明乃至界定人间伦常，并进一步作为探索和认识历史规律、社会结构的一套系统。天道在中国上古并非宗教信仰的对象，而是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社会法则、历史规律的一种古典式表达，中国古代文化才具备了其强大的包容性。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

中华文明发展与“大一统”观念的关系

■李勇刚：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讲的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博大精深”则关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这是中华文明在漫长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极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对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世界上有着“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历史的国家或地区只有中国。其文明思想根源是“中”与“中和”的理念，二者是“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核心价值。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一成不变、停滞不前。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不断直面挑战，迎接挑战，一次次走向新的辉煌，在悠久的历史中整体延续着自身的元气与生机，使中华文明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一个充满了活力、不断汲取内外多维文化、海纳百川的开放系统。面对与自身不同的他者，中华文明首先是尊重之，形成了兼收并蓄、和实生光的包容性。“大一统”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不仅是一个政体概念，也是一个政道概念。在政权上定于一，才有所谓“中国”。在文明上合为一，才有所谓“中华文明”。正是基于“大一统”传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国人形成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天下观念，成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心理基础。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

■韩建业：根据考古发现，“天圆地方”这样的一元宇宙观，“敬天法祖”这样的核心信仰，早在8000年前后就已经成为中国黄河、长江和西江河流域等地的普遍共识，因此8000年前也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间点。中国地域广大、环境多样，彼此间不断交流融合，距今6000年左右正式形成“一体”格局，称之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后世则发展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在“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文化起到了主导和核心作用，随后夏王朝诞生，初步实现了政治“大一统”，有了“政治上的中国”。西周和秦汉以后政治“大一统”和“政治上的中国”不断发展。

中华文明不同于西亚、希腊那样的“城邦文明”，不同于文化高度同质化的埃及文明。她因“一元”宇宙观而本质上趋向于“一体”“一统”，因“多支”“多样”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这种“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格局，是中华文明长存于世的根本之道，也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本所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从中华文明的源头汲取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的力量

■张连起：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宝藏，也是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源头活水”。中国传统

文化中有无数治国理政资源，中国拥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本质上是有最深厚、最悠久、最丰富的文化资源支撑。政协委员要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一体多元的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演进历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把握，这正是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意义和着力点所在。

中华早期文明就有了先贤治国和协商民主的文明形态，这对于当下专门协商机构树立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团结思维，对于文明竞争、制度竞争提供了根源性话语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协商民主的丰厚土壤，也是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文明基因”。人民政协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中的协商文化，让政协委员能够更广泛、更务实、更充分地协商议政，

互动交流观点集锦

了解中华文明的长度，是为了认识中华文明的高度，认识中华文明的宽度，才能真的理解中华文明的深度。中华文明几千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拟的。对于中国文明的研究，现在多学科综合研究非常有意义，对于中华文明的研究要加大力度，把中华文明研究引向深入，走出盲目的疑古时代。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高对中华文明探源重要意义、重要性的认识，加深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理解和支持；要继续推动《关于全面开展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提案的落实；要用好出土文物和遗址，夯实考古技术研究，特别是要加强跨学科的交流合作和研究；要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交流互鉴，推进文明的比较研究，通过真实的中华文明研究成果普及中华文明的义利观。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党组书记刘玉珠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从国家层面部署实施的研究中国文明历史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是几代学者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接续努力的成果，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探索未知、揭示本源”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

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强调现代科学技术支撑和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努力实现从学科“相加”到学科“交叉”，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各项研究走向深入。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科学布局，以《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文件出台为契机，统筹解决科研任务、基地平台、人才队伍、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带动解决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支撑引领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

黄河中上游古文明遗址应该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对探究中华文明的内涵、外延有重要意义。建议国家层面相关部门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主线，加大对探究区域古文明的支持力度，尤其是支持对黄河中上游古文明遗址的多学科考古研究，来探究描绘中华文明如何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的演进路径。通过加强黄河上游古文明遗址的保护利用研究，释放古文明遗址赋能区域综合发展的最大效益，巩固脱贫攻坚，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让遗产成果惠及百姓共享文化遗产传承的成果。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马东平